

澳門回歸歷程口述史

變革前線

1

李向玉

從中蘇衝突戰場到
中葡談判前線



訪談日期：2019年5月3日



李向玉，1971年進入有「中國外交官搖籃」之稱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修讀英國語言文學。1975年因成績優異，獲選到澳門深造，在當時南光公司開辦的葡文培訓班，隨儒里奧·迪尼斯（Júlio Pereira Dinis）等葡國教師學習葡語三年。1978年，返回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葡語教師。1982年，獲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獎學金，奉派至里斯本大學文學院深造，師從葡萄牙著名語言學家馬拉加（João Malaca Casteleiro）教授。1984年，中葡談判前期籌備工作需要中葡翻譯人員，李向玉獲南光公司物色參與其中，並從事澳門問題調研工作。1988年中葡土地小組成立，他在小組中擔任中方聯絡官。在中葡談判以及澳門過渡期，中央政府及其他內地官員頻繁赴澳與葡方會談，李向玉經常負責相關翻譯工作，曾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兼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前港澳辦主任姬鵬飛、魯平等領導人做隨行翻譯。1994年，轉至教育領域，任澳門教育司司長施綺蓮（Maria Edith da Silva）的顧問。1996年任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副校長，次年升任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1999年6月16日，獲澳門政府任命為澳門理工學院首位華人院長，2018年8月31日任期屆滿榮休。

在澳門學習葡語的日子

問：你當年在北京長大的情況是怎樣的？為甚麼後來會學習外語？

答：在具體回答為何學習葡語的問題之前，我先概括一下我在澳門的情況。我是1975年來澳門學習葡語的，學了三年葡語後，1978年返回北京做教師。1984年再次來澳後，進入南光公司，歷經中葡談判的全部過程。之後在教育司(即今「教青局」)和理工學院工作至1999年澳門回歸。學習和工作兩次來澳加起來至1999年回歸正好是十九年，即回歸前我在澳門度過了十九年的時光；回歸後從1999年算起到2018年8月底退休，又是一個十九年。這很有意思，正好是兩個巧合的相同時間段。可以說我人生中大部分時光都是在澳門度過的，某種意義上是貢獻給了澳門。當然，我更感到榮幸，澳門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

從中蘇戰場回到校園

現在回答你剛才的問題，我怎麼學起葡語來了？其實我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1969年中學畢業就被分配到東北生產建設兵團了。大家可能聽說過珍寶島事件。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東部與前蘇聯交界的烏蘇里江，而我在珍寶島附近的寶清縣待了兩年，那裏是中蘇衝突的前線。

1971年，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到東北生產建設兵團招生，因為我在兵團表現不錯，受到當時兵團的推薦。記得先是筆試，讓我簡短寫了一個東西，然後就面試，接着就沒有消息了。當我把這件事幾乎忘記的時候，突然接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的通知，讓我去北京報到。

問：你當年在東北生產建設兵團主要是做甚麼的？

答：當時正值文革時期，1969年2、3月，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爆發衝突，打了一仗。中蘇關係十分緊張，有可能引起兩國之間大規模戰爭。當時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準備打仗，所以成千上萬像我這樣十六七歲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奔赴邊疆。如果正規軍在前線打仗，需要有人在後方做各種後勤支援保障，這就是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任務。我和眾多年輕人就去了靠近邊境的黑龍江省生產建設兵團，平時從事農業生產勞動，戰時準備上前線打仗，後來統稱為「上山下鄉」。

問：你當時主要是在做建設？

答：我們所在的東北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隊式管理，人員編成連、營、團、師等單位。我所在的連隊位於虎林縣和寶清縣接壤的虎寶橋，主要從事畜牧生產、種植大豆。我在那裏養過豬，餵過鹿。除了生產，也有軍事訓練，隨時準備上前線打仗。幸虧後來沒有大打，中蘇就和平談判了，兩國領導人在北京達成了避免戰爭的共識，就是當時蘇聯總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在北京首都機場和周恩來總理舉行會談，握手言和，戰爭沒有打起來。幸運之神降臨，大學開始恢復招生，我就被挑選上了，時間邁入1971年。



1969年9月1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與中國總理周恩來於北京首都機場會談，化解了一場戰事。

1971年我獲北京外國語學院(北外)英語系錄取，開始學習英國的語言、文學和國際關係，學了四年。1975年我從北外畢業，當時有一個來澳門的機會，我有幸和另外四個人被派往澳門學葡萄牙語，於是我們在1975年3月來到澳門。這是我學習外語的經過。

北京恢復葡語教學

問：所以當年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挑選了你來澳門學習葡語的。你知道當時挑選的原因嗎？

答：我當時聽說過，其實是北外準備重開葡語專業。該校以前曾開辦過葡語專業，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中斷了。由於大學停辦多年，北外恢

復葡語教學急需教師。文革時期北外屬外交部管理，長期領導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兼任北外院長，而周恩來總理是名譽院長。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這些老一代革命家，無論從中國的外交需要考慮，還是從祖國統一、港澳回歸、人才培養、語言教學等問題出發，應該說都是遠見卓識，在那個時代已經了然於心，長遠謀劃了。所以，北外在文革當



南光公司由柯正平於1949年8月成立，當時稱南光貿易公司，是澳門第一批中資機構，肩負着轉運物資回內地及培訓人才的政治任務，80年代發展日趨國際化。圖為南光公司國慶門樓彩牌。

中就決定恢復葡語教學，並由當時外交部選派人員來澳參加澳門南光公司的葡文班，以充實北外師資。

問：可以介紹一下葡文班的情況嗎？

答：南光公司開設葡文班的歷史比較悠久，因為葡國長期管治澳門，有葡文教育的基礎和環境。這裏有葡文學校，像利宵中學（Liceu de Macau）就很久了，還有葡文中學、葡文小學和葡文幼稚園等。另外，當時中國同任何葡語國



葡萄牙政府早於1893年7月27日便通過設立澳門國立利宵中學，是一所葡語教學中學，1894年成立後歷經多次遷徙。圖中位於南灣的校舍1958年開始啟用，現已清拆。

家都沒有外交關係，派人到澳門學習葡文，是較為現實且便捷的選擇。早在1959年，南光公司就開始為國家的幾個部委，如外交部、經貿部、文化部，以及軍方培養數批葡語人才。

據我了解，南光公司在1959年開辦第一個葡文班，學員人數不多，且主要是澳門當地人，包括陳惠君和她的先生李錦淳等。後來由於北京開辦葡語對外廣播，陳惠君夫婦奉調到北京廣播電台（後改名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葡語部工作，支援國家廣播事業。這些澳門當地的優秀青年主要是南光公司的員工，如羅進開、羅兆華、梁自然、劉本立等後來都成為南光公司的資深葡語翻譯員，還有一大批來自內地的人士。南光公司葡文班一直辦到1992年，在三十多年中培養了眾多人才，據統計共九批近百人。



澳門土生葡人高美士曾於南光公司教葡文班，李向玉遺憾未有成為他的學生。

我就是1975年那一批的。羅進開和羅兆華是最早那一批，畢業後就留在南光公司當翻譯，也來幫助我們這些學弟學妹學習葡語。後來他們都曾擔任過新華社澳門分社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為澳門回歸祖國的偉大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剛才我講到的是南光公司葡文班學生的構成。在教師方面，最早請來的老師是澳門土生葡人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他在南光公司教葡文班直到1975年。本來曾安排高美士教我們這一批五個人學習葡語的，但我們一到澳門他就病了，很遺憾沒有成為他的學生。

只能由利宵中學的老師儒里奧·迪尼斯擔任我們的葡語教師，共三年。總之，教師隊伍主要由一些社會名人組成。還有一位教我們的名譽老師是崔樂其(Roque Choi)先生，我們跟他開玩笑稱他為「校長」。其他主要是葡國人，如馬義瑟(Mário Isaac)、杜默士(Túlio Lopes Tomás)等，後者曾任教育廳長。總之，南光公司請來的葡國老師很多。剛才我提到的幾個人，都在南光公司葡文班裏當老師。

那時用的葡文教材，主要由澳門神父顏儼若(António André Ngan)編寫，但比較陳舊。在參考資料方面，則依靠葡國的一些字典辭書。南光公司有一個小型葡文資料室和圖書館，供學員使用。

南光公司培養中國第一批葡語外交官

南光公司在這種條件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葡語外交官。最早的一批畢業生，其中最有名的是張寶生。在八個葡語國家中，與中國第一個建交的是巴西。兩國一建交，就派張寶生去巴西擔任外交官。他是我的學長，內地來的，後來還擔任過駐葡萄牙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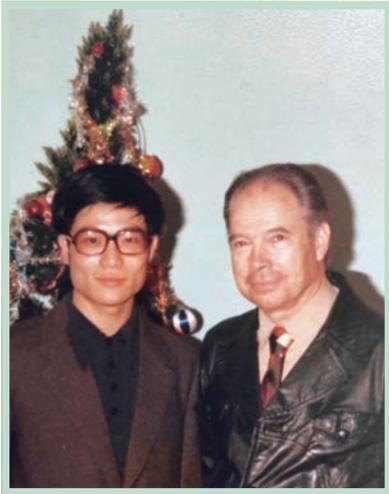
南光公司為中葡外交培養的人才中，有中國第一批駐葡語國家的大使、參贊等近百人。憶往昔看今天，澳門能夠成為中葡之間的交流合作平台，南光公司功不可沒，擔當過歷史性的開拓角色。1975年我來澳門的時候，柯正平先生正擔任南光公司總經理。南光公司在他的領導下既從事貿易，也從事一部分政治工作。

另外，當時中國尚未與葡萄牙建交，北京主要通過在澳門的南光公司和當時的澳葡管治當局與里斯本的葡萄牙政府溝通。人們通常稱那時南光公司從事政治工作的地方為「六樓」，當有人說去南光公司六樓，就知道他的目的不是去談生意。關於南光公司的歷史我今天在這裏就不多講了，言歸於他辦的這個葡文班。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裏，很多人不知道澳門鬧市中這個不起眼的葡文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了第一批葡語外交人才。我有幸1975年來澳門學習至1978年，然後回北外教授葡語。

葡文班校舍在何賢別墅

問：當時在學習葡文的過程中還認識甚麼人？你們日常是怎麼樣學習的？

答：這個葡文班是南光公司辦的，但是由何賢老先生提供辦學設施和場地。校舍就在高士德馬路94號，這個學校後來沒有了。這個學校位置很特殊，據說是何賢老先生家的一棟別墅。作為學校，裏面設有運動場、籃球場、食堂、教室和宿舍，院子裏還有木瓜樹、雞蛋花樹，香氣四溢，我們經常在那裏打籃球。



李向玉與葡語老師迪尼斯合影。

我們學習都很刻苦，很珍惜這個學習機會。一般早上六點鐘起床，洗漱完畢就開始早讀。吃完早餐後，除了午飯時間，就一直學習到晚上十點，大部分時間是自學。儒里奧·迪尼斯老師是葡萄牙萊里亞地區來的，他每天下午都到我們這個學校來，給我們講葡語、跟我們練習會話。他熱情很高，甚至帶他的太太、女兒和兒子來幫助上課，擔任「助教」，讓我們在一種家庭式的氣氛中學習葡語。我們一般在上午自習，這時我們的輔導員羅進開，偶爾也有南光公司的趙燕芳，會來輔導我們學習葡語。

我們從早到晚不僅朗讀，也有口語練習。那時沒有現在這樣子的小錄音機，南光公司給我們每人提供一台大轉盤的錄音機，由葡國人預先錄好了音，然後我們五個人各自拿着機器反覆播放，不停地重複模仿葡語的語音。

1975年到1978年的3年很快過去了。我的4位同學回外交部工作，都做了外交官。後來他們其中一人又回到澳門，他就是外交公署的前任辦公室主任邊春剛。另外一位派到葡萄牙工作和到巴西聖保羅做總領事，即孫榮茂大使。而我則回到北外擔任教師。

問：回去當老師以後情況如何？你後來又去里斯本，中間那個轉折是如何的？

答：我1978年回北外西語系教葡萄牙語，總共六年時間。其中1982年到1983年，葡萄牙有一個很有名的古本江(Gulbenkian)基金會給北京外國語學院提供獎學金去葡萄牙進修，我有幸拿到這個獎學金去里斯本大學